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唐五代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霍有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霍有明

中国文学编年史

隋
唐
五代
卷

(下)

霍中南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李永平 黄芸珠 霍有明



总序

一个“总序”是本书的“总序”，也是本书的“总序”。本书的“总序”是本书的“总序”，也是本书的“总序”。本书的“总序”是本书的“总序”，也是本书的“总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入，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 论

欧阳修《六一诗话》：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

沈括《梦溪笔谈》：晚唐士人，专以小诗著名，而读书灭裂。

蔡居厚《诗史》：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郑棨《山居》云：“童子病归去，鹿麕寒人来。”自谓铢两轻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晓来天。”对属虽偏，亦有佳处。

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同上）

吴可《藏海诗话》：老杜句语稳顺而奇特，至唐末人，虽稳顺，而奇特处甚少，盖有衰陋之气。

唐末人诗，虽格调不高而有衰陋之气，然造语成就，今人诗多造语不成。（同上）

晚唐诗失之太巧，只务外华，而气弱格卑，流为词体耳。（同上）

张戒《岁寒堂诗话》：李义山、刘梦得、杜牧之三人，笔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诗而不工古诗，七言尤工，五言微弱，虽有佳句，然不能如韦、柳、王、孟之高致也。义山多奇趣，梦得有高韵，牧之专事华藻，此其优劣耳。“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李义山此诗，非夸徐妃，乃讥湘中也。义山诗佳处，大抵类此。咏物似琐屑，用事似僻，而意则甚远，世但见其诗喜说妇人，而不知为世鉴戒。“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妆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此诗非夸王母玉桃、阿娇金屋，乃讥汉武也。“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此诗非痛恨张丽华，乃讥陈后主也。其为世鉴戒，岂不至深至切。“内殿张弦管，中原绝鼓鼙。舞成青海马，斗杀汝南鸡。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宸襟他日泪，薄暮望贤西。”夫鸡至于斗杀，马至于舞成，其穷欢极乐不待言而可知也；“不睹华胥梦，空闻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为所惑乱也。其言近而旨远，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杜牧之《华清宫三十韵》，铿锵飞动，极叙事之工，然意则不及此也。“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垆从古擅风流。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此诗送入蜀人，虽似夸文君酒垆，而其意乃是讥蜀人多粗鄙少贤才尔。义山诗句，其精妙处大抵类此。往年过华清宫，见杜牧之、温庭筠二诗，俱刻石于浴殿之侧，必欲较其优劣而不能。近偶读庭筠诗，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无礼甚矣。



刘梦得《扶风歌》、白居易《长恨歌》及庭筠此诗，皆无礼于其君者。庭筠语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无礼，其格至卑，其筋骨浅露，与牧之诗不可同年而语也。其首叙开元胜游，固已无稽，其末乃云“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此语岂可以渎至尊耶。人才气格，自有高上，虽欲强学不能，如庭筠岂识《风》、《雅》之旨也。牧之才豪华，此诗初叙事甚可喜，而其中乃云：“泉暖涵窗镜，云娇惹粉囊。嫩岚滋翠葆，清渭照红妆。”是亦庭筠语耳。

罗大经《鹤林玉露》：农圃家风，渔樵乐事，唐人绝句模写精矣。余摘十首题壁间，每菜羹豆饭饱后，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窗竹榻间，令儿童吟诵数过，自谓胜如吹竹弹丝。今记于此。韩偓云：“闻说经旬不启关，药窗谁伴醉开颜。夜来雪压村前竹，剩看溪南几尺山。”又云：“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著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略】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庐，谷雨乾时偶自锄。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韦庄云：“南邻酒熟爱相招，蘸甲倾来绿满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渔樵。”杜荀鹤云：“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蓬底独斟时。醉来睡著无人唤，流下前滩也不知。”陆龟蒙云：“雨后沙虚古岸崩，渔梁移入乱云层。归时月落汀洲暗，认得妻儿结网灯。”郑谷云：“白头波上白头翁，家逐船移浦浦风。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李商隐云：“城郭休过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沧江白石渔樵路，薄暮归来雨湿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略】温庭筠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略】杜荀鹤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略】周朴有“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略】徐铉有“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略】以至【略】“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乃赵嘏也；“禅伏诗魔归静域，酒重愁阵作奇兵”，乃韩偓也；“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乃崔涂也；“烟横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彦谦也；“水暖鳊鱼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乃郑文宝也；【略】郑谷《咏海棠》云：“秾艳最宜新着雨，妖娆全在欲开时。”【略】凡此，皆以一联名世者。【略】“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李商隐也。“蜡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此薛能也。【略】“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此罗邺也。【略】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概如此。

葛立方《韵语阳秋》：杜荀鹤、郑谷诗，皆一句内好用二字相叠，然荀鹤多用于前后散句，而郑谷用于中间对联。荀鹤诗云“文星渐见射台星”、“非谒朱门谒孔门”、“常仰门风维国风”、“忽地晴天作雨天”、“犹把中才谒上才”，皆用于散联。郑谷“那堪流落逢摇落，可得潸然是偶然”、“身为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初尘芸阁辞禅阁，却访支郎是老郎”、“谁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权门扣道门”，皆用于对联也。

杨万里《黄御史集序》：诗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盖当时以此设科而取士，士皆争竭其心思而为之；故其工，后无及焉。时之所尚，而患无其才者，非也。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则羸矣。而或者挟其深



博之学，雄隽之文，于是隳括其伟辞以为诗，五七其句读，而平上其音节，夫岂非诗哉？至于晚唐之诗，则吃而诽之曰：“锻炼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谁敢违之乎？

杨万里《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晚唐诸子虽乏二子〔按，指李、杜〕之雄浑，然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犹有《国风》、《小雅》之遗音。

严羽《沧浪诗话》：晚唐之下者，亦堕野狐外道鬼窟中。

俞文豹《吹剑录》：近世诗人好为晚唐体，不知唐祚至此，气脉浸微，士生斯时，无他事业，精神伎俩，悉见于诗。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求如中叶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长章大篇之雄伟，或歌或行之豪放，则无此力量矣。故体成而唐祚亦尽，盖文章之正气竭矣。今不为中唐全盛之体，而为晚唐哀思之音，岂习矣而不察耶？

刘克庄《韩隐君诗序》：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问，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袋，铲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益下，去古益远。

魏庆之《诗人玉屑》中引韩驹语：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

郝经《与撒彦论诗书》：呜呼，自李、杜、苏、黄已不能越苏、李，追三代，矧其下乎。于是近世又尽为辞胜之诗，莫不惜李贺之奇，喜卢仝之怪，赏杜牧之警，趋元稹之艳。又下焉则为温庭筠、李义山、许浑、王建，谓之晚唐。轰轰隐隐，咄咄喧聒，八句一绝，竟自为奇。推一字之妙，擅一联之工，呕哑嚼拉于齿牙之间者，只是天地风雷、日月星斗、龙虎鸾凤、金玉珠翠、莺燕花竹、六合四海、牛鬼蛇神、剑戟绮绣、醉酒高歌、美人壮士等，磨切锼铢、偶韵较律、逗竹排比而以为工，惊嚇喝喊而以为豪；莫不病风丧心，不复知有李、杜、苏、黄矣，又焉知三代、苏、李性情风雅之作哉。

王祜《练伯上诗序》：古今诗道之变非一也。气运有升降，而文章与之为盛衰，盖其来久矣。【略】韩退之、柳宗元起于元和，实方驾李、杜。而元微之、白乐天、杜牧之、刘梦得，咸彬彬附和焉。唐世诗道之盛，于是为至，此又一变也。然自大历、元和以降，王建、张籍、贾浪仙、孟东野、李长吉、温飞卿、卢仝、刘叉、李商隐、段成式，虽各自成家，而或沦于怪，或迫于险，或窘于寒苦，或流于靡曼，视开元远不逮。至其季年，朱庆馀、项子迁、郑守愚、杜彦之、吴子华辈，悉纤弱鄙陋而无足观矣。此又一变也。

辛文房《唐才子传》：观唐诗至此间，弊亦极矣。独奈何国运将弛，士气日丧，文不能不如之。嘲云戏月，刻翠粘红，不见补于采风，无少裨于化育，徒务巧于一联，或伐善于只字，悦心快口，何异秋蝉乱鸣也。于湮、邵谒、刘驾、曹邴等，能返棹下流，更唱瘠俗，置声禄于度外，患大雅之凌迟，使耳厌郑、卫，而忽洗云和；心醉醇醪，而乍爽玄酒。所谓清清冷冷，愈病析醒，逃空虚者，闻人足音，不亦快哉？晋处士戴颙春日携斗酒，往树下听黄鹂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者，岂徒然哉！于数子亦云。

方回《瀛奎律髓》：晚唐人非风花雪月禽鸟虫鱼竹树，则一字不能作。



予选诗以老杜为主。老杜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诗人，贾岛开一别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同上)

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同上)

高棅《唐诗品汇》：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晚唐绝句之盛，不下数千篇，虽兴象不同而声律亦未远。如韦庄后出，其《赠别》诸篇尚有盛时之余韵，则其他从可知矣。今自会昌下及五季，得四十人，共诗八十五首，为余响。(同上)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贾浪仙独变入辟，以矫艳于元、白。刘梦得步骤少陵，而气韵不足。杜牧之沉涵灵运，而句意尚奇。孟东野阴祖沈、谢，而流于蹇涩。卢仝则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诡。至于李长吉、温飞卿、李商隐、段成式专夸靡蔓，虽人人各有所师，而诗之变又极矣。比之大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开元哉？过此以往，若朱庆馀、项子迁、李文山、郑守愚、杜彦之、吴之华辈，则又驳乎不足议也。

杨慎《升庵诗话》：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三百篇》皆民间士女所作，何尝撚须。今不读书而徒事苦吟，撚断肋骨亦何益哉。晚唐惟韩、柳为大家。韩、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余如李贺、孟郊，祖《骚》宗谢；李义山、杜牧之学杜甫；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彼学张籍、贾岛者，真处裊中之虱也。二派见《张洎集》序项斯诗，非余之臆说也。

许浑《莲塘》诗：“为忆莲塘秉烛游，叶残花败尚维舟。烟开翠扇清风晓，水泛红衣白露秋。神女暂来云易散，仙娥终去月难留。空怀远道难持赠，醉倚西阑尽日愁。”此为许《丁卯集》中第一诗，而选者不之取也。他如韦庄“昔年曾向五陵游”一首，罗隐《梅花》“吴王醉处十余里”一首，李郢《上裴晋公》“四朝优国髻成丝”一首，皆晚唐之绝唱，可与盛唐峥嵘。惟具眼者知之。

王世贞《艺苑卮言》：灵武回天，功推李、郭；椒香犯辟，祸始田、崔。是则然矣。不知僖、昭困蜀、风时，温、李、许、郑辈得少陵、太白一语否。有治世音，有乱世音，有亡国音，故曰声音之道与政通也。大力者为之，故足挽回颓运，沉几者知之，亦堪高蹈远引。宋诗如林和靖《梅花》诗，一时传诵。“暗香”、“疏影”，景态虽佳，已落异境，是许浑至语，非开元、大历人语。至“霜禽”、“粉蝶”，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风骨苍然。其次则李群玉云：“玉鳞寂寂飞斜月，素手亭亭对夕阳。”大有神采，足为梅花吐气。

晚唐诗押二“楼”字，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长笛一声人倚楼”，皆佳。又



“湘潭云尽暮烟出（时本皆作“山”），巴蜀雪消春水来”大是妙境。然读之，便知非长庆以前语。（同上）

何孟春《余冬诗话》：诗之讽刺者，如章碣《东都望幸》云：“懒修珠翠上高台，眉目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意自可见。若胡曾之作：“翰院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只是骂詈语耳。

黄佐《唐音类选序》：晚唐之诗，文宗仅知绝句，而臣民习之，精致已愧盛时。然巨篇闾尔，蔑闻排律，唯应科第，拘拘偶对，恣为绮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许浑，其近焉者也。其音怨以肆，其词曲而隐，其五季之先驱乎。

胡应麟《诗薮》：唐七言律自杜审言、沈佺期首创工密。【略】张籍、王建略去葩藻，求取情实，渐入晚唐，又一变也。李商隐、杜牧之填塞故实，皮日休、陆龟蒙驰骋新奇，又一变也。许浑、刘沧角猎俳偶，时作拗体，又一变也。至吴融、韩偓香奁脂粉，杜荀鹤、李山甫委巷丛谈，否道斯极，唐亦以亡矣。

五七言律，晚唐尚有一联半首可入盛唐。至绝句，则晚唐诸人愈工愈远，视盛唐不啻异代。非苦心自得，难领斯言。（同上）

晚唐句“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树色连关迥，河声入海遥”、“水向昆明阔，山通大夏深”、“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树势飘秦远，天形到岳低”、“大河冰彻塞，高岳雪连空”、“河势昆仑远，山形菡萏秋”，皆有盛唐余韵。（同上）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岂不一唱三叹？而气韵衰飒殊甚。“渭城朝雨”自是口语，而千载如新。此论盛唐晚唐三昧。（同上）

晚唐绝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皆宋人议论之祖。间有极工者，亦气韵衰飒，天壤开、宝。然书情则恻怛而易动人，用事则巧切而工悦俗，世希大雅，或以为过盛唐，具眼观之，不待辞毕矣。（同上）

王世懋《艺圃撷余》：晚唐诗，萎茶无足言。独七言绝句，脍炙人口，其妙至欲胜盛唐。愚谓绝句绝妙，正是晚唐未妙处。其胜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绝句之源，出于乐府，贵有风人之致。其声可歌，其趣在有意无意之间，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莲、龙标二家诣极，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议论高处，逗宋诗之径。声调卑处，开大石之门。

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傅初盛，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然使诵其诗，果为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当上宗，议论亦莫轻道。诗必自运，而后可以辨体；诗必成家，而后可以言格。晚唐诗人，如温庭筠之才，许浑之致，见岂五尺之童下，直风会使然耳。览者悲其衰运可也。故予谓今之作者，但须真才实学。本性求情，且莫理论格调。（同上）

许学夷《诗源辩体》：或问：“唐末之纤巧，与梁陈以后之绮靡，孰为优劣？”曰：“诗文俱以体制为主。唐末语虽纤巧，而律体则未尝亡；梁陈以后，古体既失，而律体



未成，两无所归，断乎不可为法。”

或谓晚唐人多用山水、木石、烟云、花鸟为诗，故其格甚卑，舍此可以观诗矣。予曰不然。诗有赋比兴，山水、木石、烟云、花鸟，即古诗之比兴也。孔子论诗，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故山水、木石、烟云、花鸟，自《三百篇》而下，即初盛唐不能舍此为诗，顾可以责晚唐乎？晚唐之诗，惟是气象萎茶，情致都绝，而徒籍于山水木石以为藻饰，故其格卑下，要不可尽废山水木石而为诗也。逮于唐末诸子，乃欲尽去铅华，专尚理致，于是山水木石之语废，而议论意见之词繁，故必致于鄙俗村陋耳。（同上）

或曰：唐末诗不特理致可宗，而情景俱真，有不可废。赵凡夫云：情真景真，误杀天下后世。不典不雅，鄙俚迭出，何尝不真？于诗远矣！古人胸中无俗物，可以真境中求雅；今人胸中无雅调，必须雅中求真境。如此求真，真如金玉；如彼求真，真如砂砾矣。大抵汉唐之真如此，宋人之真如彼；初盛之真如此，晚唐之真如彼。二法悬殊，不可不辩。（同上）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晚唐诗有极妙而与盛唐人远者，有不必妙而气脉神韵与盛唐人近者。“不必妙”三字甚难到，亦难言，妙不足以拟之矣。

看晚唐诗，但当采其妙处耳，不必问其某处似初、盛与否也。亦有一种高远之句，不让初、盛者，而气韵幽寒，骨响崎嶇，即在至妙之中，使人读而知其为晚唐，其际甚微，作者不自知也。（同上）

吴乔《围炉诗话》：开成以后，诗非一种，不当概以晚唐视之。如“时挑野菜和根煮”、“雪满长安酒价高”之类，极为可笑。平浅成篇者，亦不足观。至如《落花》之“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五更风雨葬西施”，《节使筵中》之“幕外刀光立从官”，《牡丹》起句之“邀勒东风不早开，众芳飘后上楼台”，《妓人》之“剑截眸中一寸光”、“薄命曾嫌富贵家”、“瘦去谁怜舞掌轻”，《吊李义山》之“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别妓》之“枕上相看直到明”，《忆妾》之“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之类，皆是初唐人未想到者，故能发学者之心光，岂可轻视？初盛大雅之音，固为可贵，如康庄大道，无奈被沈、宋、李、杜诸公塞满，无下足处，大历人不得不凿山开道，开成人抑又甚焉。若抄旧而可为盛唐，韦、柳、温、李之伦，其才识岂无及弘、嘉者？而绝无一人，识法者惧也。

吴乔《答万季野诗问》：晚唐虽不及盛中唐，而命意布局，寄托固在。宋人多是实话，失《三百篇》之六义。

贺贻孙《诗筏》：晚唐七言绝句妙处，每不减王龙标。然龙标之妙在浑，而晚唐之妙在露，以此不逮。

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然自皎然外，应推无可、清塞（即周贺）、齐己、贯休数人为最，以此数人诗无钵孟气也。僧家不独忌钵孟语，尤忌禅语。近有禅师作诗者，余谓此禅也，非诗也。禅家诗家，皆忌说理，以禅作诗，即落道理，不独非诗，并非禅矣。诗中情艳语皆可参禅，独禅语必不可入诗也。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由悟遣言，故慧。”余谓不然。僧诗清者每露清痕，慧者即有慧迹。诗以兴趣为主，兴到故能豪，趣到故能宕。释子兴趣索然，尺幅易窘，枯木寒岩，全无暖气，



求所谓纵横不羁，潇洒自如者，百无一二，宜其不能与才人匹敌也。每爱唐僧怀素草书，兴趣豪宕，有“椎碎黄鹤楼，踢翻鹦鹉洲”之概。使僧诗皆如怀素草书，斯可游戏三昧，夺李、杜、王、孟之席，惜吾未见其人也。（同上）

唐诗大振，妇女奴仆，无不知诗，远及外域，亦喜吟咏。妇女则李季兰有诗豪之誉，薛涛有校书之称，鱼玄机、徐月英各著诗集，非烟、崔仲容并骋俚词，然桑、濮之音耳。（同上）

刘大勤《师友诗传续录》：问：“元人诗亦近晚唐，而又似不及晚唐，然乎否耶。”答：“元诗如虞道园，便非晚唐可及。杨铁崖时涉温、李，其小乐府亦过晚唐。他人与晚唐相出入耳。晚唐如温、李、皮、陆、杜牧、马戴，亦未易及。”

田雯《古欢堂杂著》：义山佳处不可思议，实为唐人之冠。一唱三弄，余音袅袅，绝句之神境也。飞卿什之一耳。【略】樊川鬓丝禅榻，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圣、昭谏皆有妙境。松陵两君子，别具风骨，不屑雷同。

顾嗣立《寒厅诗话》：诗家点染法，有以物色衬地名者，如郑都官“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是也。有以地名衬物色者，如韦端己“落星楼上吹残角，偃月营中挂夕晖”是也。

毛先舒《题倪鲁玉诗》：唐人诗有中晚，余意尝优晚。盖中唐虽若自然，乃多失之俚浅。晚叶诸公，刻画惊挺，而引信多遥思，故为胜也。至金荃、玉谿，尤觉有神来之妙，余昔尝日夕讽咏，描摹莫逮。

查克宏《晚唐诗钞序》：诗莫备于有唐三百年。自初盛之浑雄，变而为中唐之清逸，至晚则光芒四射，不可端倪，如入蛟人之室，谒天孙之宫，文彩机杼，变化错陈。密丽若温、李，奥峭若皮、陆，爽秀条畅若韩、薛、韦、罗……实殿三唐之逸响，著两宋之先鞭者也。所谓锦绣、纂组、雕绘之属，非工力之巧者，孰克为之？若涂泽字句，摹写声律，左初盛者未免有吴下充头之消矣。故与其古而伪，毋宁近而真。

郎廷槐《师友诗传录》：萧亭答：诗自李、杜以来，大家名家，指不胜数。毋论贞元、元和。即晚唐温、李、皮、陆辈，各有至处，自成一家。宋人杨文公、钱思公、晏元献、胡文恭皆宗之。欧、苏二文忠公出，而始变其法。

叶燮《原诗》：论者谓晚唐之诗，其音衰飒。然衰飒之论，晚唐不辞；若以衰飒为贬，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时，四时有春秋，春气滋生，秋气肃杀，滋生则敷荣，肃杀则衰飒，气之候不同，非气有优劣也。使气有优劣，春与秋亦有优劣乎？故衰飒以为气，秋气也。衰飒以为声，商声也。俱天地之出于自然者，不可以为贬也。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秾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沈德潜《说诗晬语》：晚唐人诗：“鹭鸶飞破夕阳烟”、“水面风回聚落花”、“菱荷翻雨泼鸳鸯”，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尽句中矣。又张翥《洞庭湖》诗：“青草浪高三月渡，绿杨花扑一溪烟”，“绿杨”一语，分明村港小景，赋洞庭湖宜尔耶？“破”字、“聚”字、“泼”字、“扑”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贾长江“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温飞卿“古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卑靡



时乃有此格。后惟马戴亦间有之。(同上)

纪昀《瀛奎律髓刊误》:晚唐诗但知点缀景物,故宋人矫之以本色为主。

晚唐诗往往露骨,然佳句不可没。(同上)

翁方纲《石洲诗话》:杨诚斋谓“诗至晚唐益工”,盖第挑摘于一联一句间耳。以字句之细意刻镂,固有极工者,然形在而气不完,境得而神不远,则亦何贵乎巧思哉!

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凡例》:晚唐自樊川、玉谿外,几于异曲同声。温虽与李齐称,特以“三十六体”耳,非匹敌也。韩致尧哀音怨乱,不害其为丹山雏凤。

赵翼《瓯北诗话》: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言律至长庆以后,奄奄一息。温、李二集,正如渔歌牧笛,忽闻钟鼓嘈呖。晚唐虽雅不胜郑,其秀出者,犹非宋、元人可及。兹选于黄茅白苇中,一律之工,未尝轻掷,正以其难得为可贵也。高廷礼盛许刘沧,今观《怀古》诸篇,全不争工起讫,殆无一篇完善可收。郑谷、曹唐,有识皆嗤,更不具论。唐末七言,韩至尧为第一,去其《香奁》诸作,多出于爱君忧国,而品格颇近浑成。次即吴子华,亦推高唱。司空表圣《归瑄谷作》,有蜕弃轩冕之风。罗昭谏《驾幸蜀》诸章,见不忘本朝之意。全军之殿,数子为多。

袁枚《随园诗话》:诗人家数甚多,不可轻轻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为是,而妄薄前人。须知【略】悱恻芬芳,非温、李、冬郎不可。

阮亭诗话,道晚唐人之“布谷啼春雨,杏花红半村”,不如盛唐人之“兴阑啼鸟缓,坐久落花多”。余以为真耳食之论。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故不知两诗之各有妙境。若以浑成而言,转觉晚唐为胜。(同上)

方南堂《辍锻录》:咏物题极难。【略】元和以后,下逮晚唐,咏物诗极多,纵极巧妙,总不免描眉画角,小家举止,不独求如杜之咏马、咏鹰不可得见,即求如李之《早燕》大方而自然者,亦难之难矣。

晚唐自应首推李、杜,义山之沉郁奇谲,樊川之纵横傲岸,求之全唐中,亦不多见,而气体不如大历诸公者,时代限之也。次则温飞卿、许丁卯,次则马虞臣、郑都官,五律犹有可观,外此则邾、莒之下矣。(同上)

黄叔灿《唐诗笺注凡例》:唐诗至中、晚之世语愈工则意愈薄,而格亦渐卑。如《丁卯》、《碧云》、《浣花》诸集,前辈有“诗家乡愿”之讥。

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唐人佳句,有可以照耀古今,脍炙人口者。如【略】李义山之“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晚凉风过竹,深夜月当花”,马戴之“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张乔之“夜火山头市,春江树杪船”,杜荀鹤之“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略】僧齐己之“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略】许郢州之“溪云初起日沈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李频之“去雁远冲云梦雪,离人独上洞庭船”,赵嘏之“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韦庄之“心如狱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载酒客寻吴苑寺,倚楼僧看洞庭山”,方干之“树